

#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 阶层结构变迁与消费升级

张 翼

---

**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型。社会结构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等多元共存的社会。消费的升级过程表现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过程。对于不同的阶层而言，消费升级即是一个复杂的、梯度跟进的、对美好生活的主观需求存在异质化追求特征的生活改善过程。要释放出阶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红利，就需要针对不同的阶层需求设计激励政策，并以底线公平法则塑造消费环境。

**关键词：**阶层结构 消费升级 消费结构 中产阶级

作者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45）。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在中高端消费中要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sup>①</sup> 消费社会学的研究业已发现，阶层的形成与阶层的分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变迁等，对消费的升级、消费的中高端市场的培育、消费领域新增长点的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意义。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型。应该说，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劳动力人口从定居就业转变为迁居就业、在家户（household）规模从大家庭转变为小家庭或单人家庭、在聚落方式从乡村转变为城镇、在大众传媒从人际与传统媒体转变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也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等多元共存的社会。

与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借助于市场的调节，中国不仅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且也以丰富的人口红利支撑起“中国制造”，为世界各国供给了琳琅满目的出口商品。中国的内部市场也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型。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更是从自给与半自给的社会转变为以商品为主的社会，从供给不足与商品短缺的社会转变为供给充足与商品多样化的社会。人们的消费习惯，也从模仿型排浪式过渡到个性化与定制化。中国社会已经发生

---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或仍在继续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渐进的、梯度升级的、各个阶层都在日益改进的生活方式革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在不同阶层体现着转型社会的、阶段性变化的、既存在共性追求又相互区别的结构性与排优序特征。

消费品的流动与分配方式也从再分配模式转变为市场流通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单位内部分配、票据分配与身份等级分配等，也逐渐转变为消费品在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分配。毋庸置疑，收入的多寡、购买力的强弱、消费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安排、消费与储蓄的预期心理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品的市场转型与消费者对商品与服务的自我分级。不同阶层的收入不同、审美品位不同、消费与劳动过程的价值追求不同，由收入所决定的各个阶层的消费结构也会不同。

正因为如此，消费的升级过程表现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过程。要分析消费结构的转型或消费的升级过程，就必须首先分析阶层结构的变迁过程。

##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职业分化的进行，中国的阶层结构，开始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步转变为多阶层结构。不同的社会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为不同的阶层结构，因此才有“十大阶层说”、“六个阶层说”、“五个阶层说”等。虽然每个学者划分阶层的理论依据及可资利用的数据不同，但在划分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农民阶层的缩小、工人阶层的壮大与中产阶层的崛起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基本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

在 2000 年之前，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学界没有收集到可以划分阶层的、具有全国性代表意义的量化数据。自 2001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较早地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根据连续五轮的全国性 CSS（Chinese Social Survey）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农民阶层的人数长期处于下降的态势。在 21 世纪之前的各个统计年度，农民阶层的人数占比曾经居高不下。但在改革开放加快了城镇化速度之后，农民阶层主要以向农民工转化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阶层位置。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农民阶层与土地的结合形塑了定居社会的基本形貌，熟人社会与村落内部的亲缘化家族关系，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形塑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消费结构。1978 年，中国 70.5% 的劳动力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绝大多数属于农民阶层。1990 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60.1%，2000 年降低到 50%，2010 年降低到 36.7%，2016 年降低到 27.7%。<sup>①</sup> 因为 2017 年全年的农民工数量又有所上升，所以，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下降。在这里，如果只以 60 岁以下的劳动参与人口划分阶层，则农民阶层的人数会下降到 25% 以下。

第二，工人阶层所占比重在达到峰值后也开始下降。工人阶层的主要来源，其一是工人阶层自身的代际生产与再生产（这个群体所占比重处于下降态势），其二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代内流动（这个群体所占比重仍然处于上涨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农民阶层在比较收益的诱致下，通过草根性流动，在农闲时间就近流动到城镇打工或搞副业，将自己短期转变为农民工。但伴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的长期就业人员。到“八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7》表 4-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第 99 页。

零后”成为农民工主体之后，农民工就转化为“农业户口”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标准概念。因为这个被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从其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起，就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根本就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是名符其实的产业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壮大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履历同步发展。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因为出口增长率的萎缩，工人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开始降低。根据我们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2010年在所有劳动参与人口中其占比在36%左右，目前下降到33%左右。农民阶层的工人阶层化，不仅将中国从定居社会转型为迁居社会，而且改变了自给自足的社会基础，使绝大多数人口进入到商品化生活阶段。最初，农民工是自带口粮进城打工。在粮票制废除之后，农民工在城市与城镇的消费，就完全商品化了。如果以常住人口计，则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被城镇化为产业工人与服务业工人了。

第三，雇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社会阶层。如果我们将雇佣人数等于或超过3人、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定义为雇主阶层的话，那么，在2000年之前，这个阶层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不足3%，在2010年达到4%左右，目前大约在5%。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收入较高，既有工资性收入，也有财产性收入。在西方各国，雇主阶层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3%，但在中国的目前阶段，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支持，其所占比重才高于欧美各国。

第四，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缓慢上升。这个阶层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社会阶层。有些社会学家将这个阶层翻译为“旧中产阶层”，其实含义都是英文的old middle class。主要指那些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劳动经营过程的人员。虽然这些人有时也发生雇佣行为，但雇员主要以家庭成员为对象，雇佣人数也在2人以下。总体来说，这个阶层的文化程度不高，生产资料规模较小、经营中的盈利较低。在2000年之前，其大约占劳动参与人口的10%，最近上升到15%左右。其中的一部分属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员，一部分属于城市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小商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城市拆迁改造中分得了“底商”的周边农村失地农民。市场经济的存在，给老中产阶层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阶层有很大不同。

第五，新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不管是中国国内的学人，还是西方各国的专家，都把中国新中产阶层的崛起确定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这个阶层之所以叫做新中产阶层，是其与老中产阶层相比而显示出的“无资产”特征。即使其投资了所谓的“产业”或入股于某些产业，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劳动过程与自己投资或入股的产业没有关系。而且，这个阶层还普遍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据人力资本优势，比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平均收入高出很多。在2000年之前，其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不到7%，但伴随大学的扩招、伴随企业的升级换代、也伴随第三产业的扩张，新中产阶层的人数与比重迅速提高，2010年达到13%左右，目前达到19%左右。伴随整个中国后工业化态势的显化，这个阶层的人数占比还会更为迅速地增长。他们既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阶层，也是新生的新消费拉动的主力。媒体报道的出境游与出境品牌消费，主要发生在这个阶层身上。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与原来截然不同。中国不仅已由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等多元并存的社会，而且在转变中强化了中产阶层的崛起趋势。在以职业为标准并结合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而划分的阶层结构中，农民阶层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已降低到28%左右（如果只以60岁以下的劳动参与人口分析，则农民阶层所占比重会下降到25%以下）。伴随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进行，也伴随老年农民参与生产可能性的降低，这个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工人阶层在工业化初期的扩张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但在工业化基本完成过程中，已伴随生产自动化水平的升级而趋于缩小，在后工

业化特征越来越强的发展路径中，这个阶层所占比重还会继续降低。从新加坡、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发展经验看，老中产阶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再具有扩张的动力。从西方各国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雇主阶层的占比也不会超过 5%。在美国当前的劳动参与人口中，雇主阶层不仅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而且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是小雇主——比如说，在美国的整个雇主阶层中，有 54% 左右雇主的雇员人数在 4 人以下，95% 的雇主的雇员人数在 50 人以下。<sup>①</sup> 所以，中国未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新中产阶层的高歌猛进。

## 二、社会发展、阶层结构与消费升级

一般而言，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家庭总消费中、或者在单个人组成的以住户为计量单位的总消费中食品消费的比重会趋于降低。反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越低，则其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这个现象叫做恩格尔定律。我们曾经以恩格尔系数为标准，讨论过启动消费的社会政策因素。<sup>②</sup>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个人或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 19% 及以下为最富裕，在 20%—29% 之间为富裕水平，在 30%—39% 之间为相对富裕水平，在 40%—49% 之间为小康水平，在 50%—59% 之间为温饱水平，在 60% 以上为贫困水平。

以此衡量中国的消费升级过程就会发现：

1978 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 57.5% 和 67.7%。因为农村人口远远大于城镇人口，所以，经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大于 60%。从总体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高。

1990 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 54.2% 和 58.8%，基本达到了温饱水平。

2000 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 39.4% 和 49.1%，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

2010 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 35.7% 和 41.1%，城镇达到了相对富裕水平，农村接近小康水平的上限。

表 1 给出了最近几年全国层面的恩格尔系数。2013 年恩格尔系数降低到 31.2%，2014 年降低到 31%，2015 年降低到 30.6%，2016 年降低到 30.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消费区间，中国当前的消费水平已经从总体上达到了相对富裕水平。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消费，首先从贫困水平升级到温饱水平，然后从温饱水平升级到小康水平，目前正在向相对富裕水平升级。这个升级过程带来的重大变迁是：中国正在从以食品为主而发生消费行为的阶段过渡到以食品之外的其他消费为主而形成新消费结构的阶段。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发生在居住类的消费占比都在 22% 左右，发生在交通通信类的消费也长期在 13% 左右，发生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更达到了 11% 左右。即使是在食品消费中，中国人也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阶段过渡到以蔬菜、蛋、奶、肉、果品等为主而形成新消费趋势的阶段。比如说，从 2013 年到 2016 年，中国人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从 148.7 公斤降低到 132.8 公斤，但与此同时，干鲜瓜果类的消费量，则从 40.7 公斤增长到 48.3 公斤，蛋类消费量从 8.2 公斤增长到 9.7 公斤，肉类消费量从 25.6 公斤增长到 26.1 公

① 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见 <https://www.bls.gov/bdm/sizeclassqanda.htm>，2018 年 2 月 11 日。

② 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斤。<sup>①</sup>与此同时,自 2013 年到 2016 年,中国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的拥有量,从 16.9 辆提升到 27.7 辆;每百户家庭的电动助力车,从 39.5 辆增长到 53.2 辆;每百户家庭的移动电话,从 203.2 部增长到 235.4 部,每百户家庭的计算机,从 48.9 台增长到 57.5 台。<sup>②</sup>

表 1 2013—2016 年居民家庭在消费分项中的占比 (%)

列项	2013	2014	2015	2016
食品 (恩格尔系数)	31.21	31.01	30.64	30.10
衣着	7.77	7.59	7.41	7.03
居住	22.68	22.09	21.76	21.90
生活用品	6.10	6.14	6.06	6.10
交通通信	12.31	12.90	13.28	13.66
教育文化娱乐	10.57	10.60	10.97	11.19
医疗保健	6.90	7.21	7.41	7.64
其他用品及服务	2.46	2.47	2.48	2.37
总消费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7》表 6-1,第 162 页。

所以,中国的消费升级,一方面体现为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下降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为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占比逐步下降的过程。实践证明,只有消费者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方面消费占比增加,才可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消费的升级过程,才既是消费中粮食消费占比逐渐下降的过程,也是消费者从以消费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型到消费耐用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为主的过程。

但在看到普遍意义的消费升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在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社会,平均计算的恩格尔系数会由于富裕阶层的存在而被大大拉低。当然,由于一定时期食品与其他商品物价变化的比率会存在差异,所以,有些商品价格的系统性上升(比如房价),会压缩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开支,或者夸大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的消费改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通过对不同阶层恩格尔系数的估计来检视不同阶层的消费升级过程。

表 2 各个阶层在不同消费分项中的占比 (%)

	食品 (恩格尔系数)	衣着鞋帽	居住购房按揭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	人情往来	其他
雇主阶层	21.14	7.61	20.14	4.43	6.06	7.09	33.53
新中产阶层	24.50	8.18	23.24	7.69	6.72	8.18	21.49
老中产阶层	26.51	6.02	15.59	9.57	7.98	8.32	26.01
工人阶层	30.96	7.83	14.98	10.74	7.6	9.35	18.54
农民阶层	33.66	5.83	8.62	19.00	9.02	13.3	10.57
总计	26.54	7.16	16.8	10.67	7.53	9.39	21.91

数据来源:2015 年 CSS 问卷调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进行了加权处理,但 2015 年问卷调查得到的恩格尔系数还是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从表 2 可以看出,雇主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 21.14%,已经接近“最富裕”的生活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7》表 6-4,第 164 页。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7》表 6-5,第 164 页。

水平。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也分别降低到 24.50% 和 26.51%，属于典型的“富裕”生活水平，工人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在 30.96%，还需要继续降低。农民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为 33.66%，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另外，仔细考察表 2 的分项内容还会发现，各个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很不一致。对于居住在城市的雇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来说，在每年的消费支出中，除食品外，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居住类消费（其中包括住房按揭、房租、物业费等）。在雇主阶层中，这部分消费占比达到 20.14%（接近食品消费占比的 21.14%）。在新中产阶层中，这部分消费占比达到 23.24%（也接近食品占比的 24.50%）。即使在老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中，居住类消费占比也分别达到 15.59% 和 14.98%，其占比额仅次于食品占比额。

在农民阶层那里，居住类消费占比仅为 8.62%。当然，绝大多数农民阶层居住在乡村社会，住房属于宅基地上的自建房，除电费和水费之外，没有物业费、住房按揭等开支，这自然会降低居住类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民阶层在居住地所在的中心城镇或县城等购房的比例可能还不是很大。这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的城镇化还没有为农民阶层的住房城镇化创造出机会。正因为如此，最近几轮的土地增值与商品房增值，主要给居住在城镇的各个阶层（主要是雇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带来了财富增值的机会（与此同时也蕴含一定风险）。这会加大城乡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造成实质的消费不平等。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其不仅扩大了住房的消费面积、改善了住房的舒适程度，而且也在消费的同时，坐等房产升值，通过住房买卖赚取到了更多的财富。这种“马太效应”，会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不符合底线公平的基本原则。另外，城镇与城市也集中了更为优越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居住区位的差异，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公共服务消费中的城乡差距，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

正因为如此，农民阶层除食品消费外的第二大类的开支是“医疗”费用，这个部分的占比甚至达到了 19%。尽管医疗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尽管乡镇医院更新了硬件设备，也配备了医学院的毕业生，但毋庸讳言：乡镇医院收治病人的比重却降低了。正如学校的城镇化抽离了乡村的小学、抽离了乡镇的初中和高中一样，医疗的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乡村的诊所资源、抽离了乡镇的优质医务人员。农民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疾病，都会在“转院治疗”过程中进县城或省会城市治病。这样，住院治疗就需要家人护理。医疗费用中的部分可以报销，但城市里的路费、住宿费、吃喝等费用，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城里人医疗保健费用占比的上升，可能主要不是花费在“医疗”方面，而是升级消费在“保健”方面，但农民阶层的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主要在于“医疗”占比较大。这会抑制农民阶层在其他消费方面的升级速度。

农民阶层在教育方面和人情往来方面的消费占比也比较大。伴随教育资源的集中与进城，农民阶层的子女也不断进城读书。虽然“学费”少了，但住宿费和陪读费却增加了。有些人还不得不在城市买房或租房以供子女读书。为了让子女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或者为监管子女更用心读书，很多县城催生了陪读妈妈或陪读奶奶这个职业。现在，在山区或偏远地区的乡村小学读书的学生，基本都是贫困户的子女。坚守在乡村小学的老师，也是很难进城的、学历不高的、教学能力还需要提高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问题，还影响到了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表面看起来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实质反映的是阶层再生产与阶层继承问题。人情往来的费用，或者“份子钱”、“随礼”等红白喜事费用，也是乡村社会一笔必不可少的开支，这不是简单的“移风易俗”宣传政策所能改变的。为联系城镇化过程中日益脆弱的乡土关系与人际交往纽带，农民阶层不得不开支此项费用。原来的红白喜事，在乡村社会举办，可能只需帮工即可“搭上人情”，但在市场化与进城办喜事的环境影响下，一切都“专业化”和“商

品化”了。这要求农民只能增加货币支出。所以，农民阶层在医疗、教育、人情往来等方面消费占比的居高不下（高于其他阶层），不仅表征着虚假的消费升级，而且挤压了食品升级的空间，使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失去了原初的理论意义。

### 三、各阶层的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对于不同的阶层而言，消费升级即是一个复杂的、梯度跟进的、对美好生活的主观需求存在异质化追求特征的生活改善过程。

因此，整个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心理预期性需求，其次才在收入的提升过程中转化为现实性需求。有了现实性需求，但消费品市场难以满足这种现实性需求，在封闭性市场下就会形成卖方市场，即在消费品供给不足情况下形成的价格、流通过程和需求满足程度由卖方决定的市场。如果市场的封闭性被开放性所打破，则会将卖方市场转化为“出国游”或“外部代购”，从而形成外部消费。为刺激内需，为将阶层优化所产生的消费升级动力转化为拉动内部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富有针对性地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

在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势逐步转化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到不同阶层现实需求升级的过程性特征，即有些阶层的升级过程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较快，有些阶层的升级过程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较慢。无疑，发展的滞后性会限制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发展的超越性会加快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现实问题是：通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弥合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裂隙，释放出阶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红利。

要释放消费需求的红利，就需要针对不同的阶层需求设计激励政策，并以底线公平法则塑造消费环境。对于雇主阶层来说，其收入较高、仍然会持续不断地降低食品类消费的比重，不仅在财产扩张方面形成投资性消费（即将消费与投资密切结合的消费，比如购买住房，投资医疗保险或人寿保险等），而且在保健、体育、教育、文化娱乐方面形成高端需求。市场必须针对需求侧的这些变化升级供给侧的结构，在国内市场满足这些阶层的个性化、特例化与定制化消费。

对于新中产阶层来说，其文化程度较高，品味较高。在有车有房之后，他们更加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他们不仅注意自身人力资本的接续与更新，而且极其关注子女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方面的资源选择，关注子女的特长培养，他们还具有压缩日常生活开支以支持子女求学于名校或出国留学的偏好。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他们更易于提升自己的复杂性审美能力，具有对新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冲动，对变迁的事物会保持相对较为开放的包容心理。所以，新中产阶层期望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尽可能多地扩大消费品的可选择性，他们尤其渴望文化艺术的繁荣与进步，渴望以互联网为纽带而形成的丰富的消费市场，并对影视产品保持旺盛的追求欲望。当国内的消费品市场难以满足这种消费追求时，他们会在外部市场寻找消费渠道。

对于老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工作自主性较高，收入较低但有一定保障，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他们渴望迅速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受收入的约束，他们会率先改善与时代相一致的家庭日常消费，然后模仿上层社会的“时髦”或“流行”、在日常生活的逐渐改善过程中安排自己的消费升级过程。

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他们的消费升级过程主要受制于工薪的硬约束。他们会首先改善家居环境，然后通过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工人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在深受收入约束的同时，还会受到闲暇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个阶层的消费升级，既需要通过整

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改善收入，也需要通过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以节约劳动时间，将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赢得闲暇。他们会在改善日常物质生活条件、支持子女接受相对较好的教育后，再探索和开发近距离的旅游、公共娱乐与健康产品。所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会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阶层的消费创造空间。当然，为模仿上层阶层的消费模式，他们还梦想会有第二套住房。

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他们会在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之下，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提升土地产出，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模仿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当农民阶层居住在乡村时，他们最大的消费升级，就是渴望改善村落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他们有与自然保持密切接触的天性。虽然他们的居住条件已大大改善，但在乡村的空壳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或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会大大延缓他们可能存在的消费升级过程。在农民阶层就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他们会首先想到进城购房（但城市住房价格的飞涨约束了他们的梦想），然后才通过对城市市民的模仿以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会节衣缩食，但却投资于子女的教育，他们也不得不较多地消费医疗健康服务。

在看到各个阶层的消费升级需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消费的升级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为达到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目的，必须时刻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消费的升级过程，与阶层结构的变化过程密不可分。没有中产阶层的崛起，没有农民阶层的缩小，没有工人阶层收入的迅速提升，整个社会消费的升级过程就只是一个潜在的预期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中产阶层的发展，才在社会层面决定中国的消费升级速度与消费升级的结构性基础。在学术界，有些人看重消费品市场，有些人看重炫耀性诱惑，也有些人看到了实体经济的盈利压力，但却只有较少的学人注意到中产阶层的培育对消费市场的可持续价值。应该注意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实际上体现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发展的不充分。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消费的升级才可能更为显著地释放出来。

第二，在消费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加强供给侧与消费侧的匹配性，会尽可能大地释放出既有的社会消费潜力。在雇主阶层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提升之后，只有开发社会服务的多元供给，提升服务的质量，开发服务的多元结构，才能诱致消费逐步升级。如果城市加大人口控制力度，将城市服务的主体——农民工排挤出去，无疑会减少服务供给的多层次性，抬高社会服务的价格，这会抑制中下阶层对服务的消费需求。

第三，住房按揭率的上升，或者家庭债务的压力，势必影响家庭对当前收入的分配结构，并进而抑制消费的升级过程，将消费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降低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预期。尽管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很快，但如果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偿还住房按揭贷款，人们就不可能扩大其他方面的消费。

第四，对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于社会必须的社会服务的消费，既要调动市场的力量去满足供给，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去满足供给。比如对贫困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对农村基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卫生防疫资源的供给，就不能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更多地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所以，消费的升级过程，是一个系统性政策支持配置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奏效，而需要长期努力。在以市场之手配置消费资源的同时，还必须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均衡基层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弥合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保障弱势阶层的消费权利。

〔责任编辑：李文珍〕



**Changes in Chines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since the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Yi • 38 •

The biggest chang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epoch-making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long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is, it has shifted from a society dominated by farmers to a society in which farmers,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iddle class co-exist. The upgrading process of consumption shows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groups, consumption upgrade is a complex, progressive and life-improving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ous pursuits of subjective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and demand dividend brought by this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incentive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create a fair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Consumer Patterns in the New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Zhu Di • 46 •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Better Lif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Needs” and City Governance** Lin Xiaoshan • 53 •

**The Utility Space of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r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tility Framework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Ning • 60 •

**Civilization Self-Identification and Confidence: A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Hypothesi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tems from the West”** Zou Shipeng • 71 •

The hypothesi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ems from the Wes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modern times. Although it has been proved absurd by modern theories and cultural history, it has re-emerged in recent years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essence of the hypothesis is cultural monism based on Eurocentrism. Although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are interactive, it will fall into the trap of national nihilism to believe that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completely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Some accept this hypothesis just because Chinese script emerged late. This suggests a lack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confidence in our own civilization. By contrast, the theory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Kunlun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Based the Chinese spirit on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origin and multi-ethnic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aping of China’s multi-ethnicity tradi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pirit in the context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s. The discussion of origin of civilization cannot be simplified into a natural or biological discourse. The Out of Africa theory cannot expla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should go beyond monism to take endogenous origin as its basis. The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its limits. We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to its durability and its tradition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Historical Truth: On the Hermeneutical Natur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Yu Pei • 83 •

History flows in people’s never-ending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History” is the history that is interpreted. This is because the nature of history makes historical realit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historians becom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but closely related